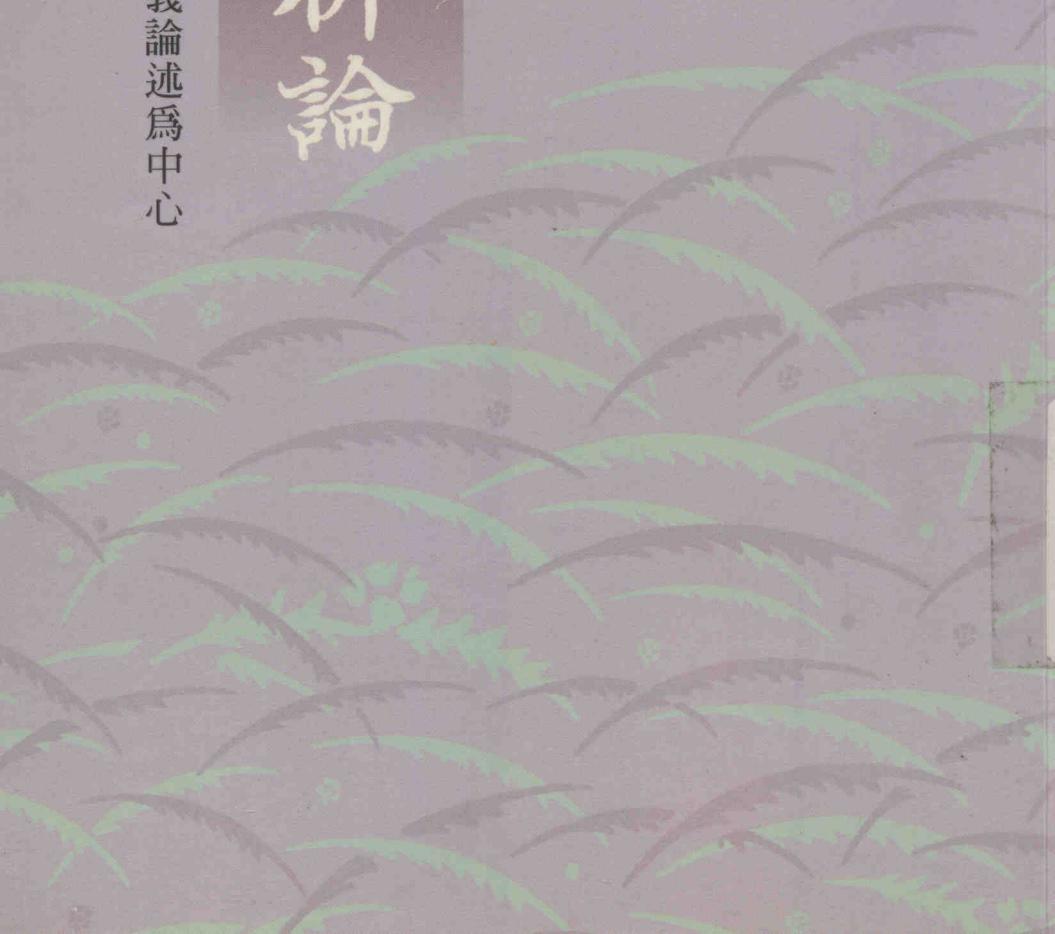


——以歐陽修與龔橙詩義論述為中心

詩本義析論



車行健 著





詩
本
義
析
論

——以歐陽修與龔橙詩義論述為中心

作者◎車行健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詩本義析論——以歐陽修與龔橙詩義論述為中心
／車行健著。

--初版。--臺北市：里仁，民91

248面；15×21公分 參考書目：15面

ISBN 957-8352-96-4 (平裝)

1. 詩經－研究與考訂

831.18

91000728

車行健著

詩本義析論

—以歐陽修與龔橙詩義論述為中心

校對人：作者自校
發行人：徐秀榮

(請准註用之商標)

台北市仁愛路二段98號五樓之2
電話：2391-3325、2351-7610。

2321-8231

FAX：3393-7766

E-mail: lernbook @ ms45. hinet. net

排版：鼎格有聲公司
印刷所：臺灣印刷有限公司
郵政劃撥：01572938「里仁書局」帳戶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廿五日初版
累積印數：1~500 (限函本)
本書編號：

參考售價：平裝 350 元

ISBN 957-8352-96-4 (平裝)

自序

本義問題是當代文論關注的焦點，但除了少數微弱的聲音之外，似乎不再有多少人對其在文學研究及詮釋中的正當性與必要性做辯護，強調多元而豐富的詮釋與解讀才是這個時代的主流意識。相形之下，拘執於「定於一」的傳統《詩經》本義觀反倒顯得不合時宜，研究這套觀點或學理豈非更是不食人間煙火，不知今夕何夕？類似的困境也存在於其他的古典學術研究領域中，在面臨當代學術與價值意識的强大質疑及挑戰之壓力下，如何為傳統學術中的豐富內涵與正面價值加以辯護，並進而抉發其現代意義；或從其內部加以調適與轉化，使其能與當代學術與價值直接軌，而重現其歷久彌新的生命力，這對從事中國古典人文學術研究的學者而言，確實是項任重道遠的艱鉅使命。

本書就是秉持上述信念來處理傳統《詩經》本義觀，藉著《詩經》學史中兩部標舉以探尋「《詩》本義」為立說宗旨的專著——歐陽修的《詩本義》與龔橙的《詩本詠》之探討，集中地對二者的多重《詩》義觀、本義觀及其對《詩》本義的實際詮釋或實踐做了番深入的闡析與探索，而且也從當代學術的立場，對二人在書中所取得的成就與限制加以比較與評判，並嘗試從二

家理論內部對其本義觀中的根本缺陷加以調適與轉化，以使其能積極對應當代學術的質疑與挑戰。當然，歐陽修與龔橙《詩》本義觀的缺陷並非二人所獨有，而是整個傳統《詩經》學，甚至整個「託意言志」的文學批評及詮釋傳統所共同具備的問題，因此根本的解決之道應是對這類型的批評及詮釋傳統進行全面且深入的反省與修正，書中所做的種種努力只及於傳統《詩經》本義觀的範圍內，不及於其他，非不願也，力所未逮也。

儘管在《詩經》本義的領域中獲得了一些小小的心得，但在研究《詩》本義的過程中，仍不斷地讓我質疑：探求本義這樣的活動，其終極意義究竟何在？或擴大來說，歷來學者孜孜不倦地在經典中探尋經義，這樣的活動其終極意義又為何呢？這不禁使我想起史鐵生的小說〈命若琴絃〉，在小說中，瞎眼老琴師須拉斷一千根琴弦才能打開琴箱，取出治好瞎眼病的藥方，以治好他的瞎眼病，此即其拉琴的目的及生存意義之所在，雖然最終藥方不過是白紙一張。但與瞎眼老琴師不同的是，探求經義者根本不知道要「拉斷多少根琴弦」才能夠獲取到「究極的經義」這樣的一個藥方，更遑論此「藥方」是否是空白的。但探求經義活動畢竟不是如同薛西弗斯搬運巨石或吳剛伐桂似地，一直在重覆那些永遠不能達致目的之荒謬舉動。應該這樣看，探求經義活動的同時，其實也是在進行一種意義探索的活動，不但會將探求出的意義反加在解經者身上，而且也會回饋給其身處的時代與歷史文化傳統，從而構成一連綿不絕，且又漫天蓋地的經義世界。當人們

皆生活在這經義世界中，這裏面又會生出一股動力，驅策著新的經義探求者再去進行經義探求的活動。如是，不斷地循環，但也不斷地前進。使得探求經義活動得以擺脫「命若琴絃」式的宿命或薛西弗斯及吳剛伐桂式的荒謬舉動。也許本書之作就是薛西弗斯在其無數次的搬運巨石或吳剛數不清的砍伐桂樹當中的其中一次，滾動巨石所生成的軌跡或砍伐桂樹所留下的斧痕難道不就是新烙印上的「意義之跡」？

是爲序。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元月車行健誌於花蓮東華大學

目錄

自序

上編·本論

第一章·論《詩》義之多重與《詩》本義之詮釋

第一節·引言

第二節·詩義之多重

第三節·詩義多重性之成因與《詩經》意義多重性的特殊性格

第四節·多重《詩》義中之《詩》本義與詮釋《詩》義的目標

第二章·歐陽修《詩本義》的《詩》義觀及其對《詩》本義的詮釋

第一節·引言

第二節·《詩本義》的多重《詩》義觀與本義觀

第三節·《詩本義》對《詩》本義的詮釋

第四節：從《詩本義》到《詩》本義 ······	七〇
第三章：龔橙《詩本義》的《詩》義觀及其對《詩》本義的實踐 ······	八三
第一節：引言 ······	八三
第二節：《詩本義》的多重《詩》義觀之淵源及其特色 ······	八五
第三節：《詩本義》的本義觀及其實踐 ······	九八
第四節：《詩本義》與《詩》本義的距離 ······	一〇六
第四章：結論 ······	一一九
第一節：歐陽修與龔橙的《詩》義觀與本義觀之回顧與檢討 ······	一一九
第二節：傳統《詩經》本義觀之省思與《詩經》本義詮釋之展望 ······	一二一
下編·附論 ······	一二九
第一章：歐陽修《詩本義》的版本問題 ······	一三一
第一節：引言 ······	一三一
第二節：宋版系統——《四部叢刊》本、《通志堂經解》本與《四庫全書》本 ···	一三二
第三節：明版系統——明抄本、明刻本 ······	一三九

第四節：結語——新校本的展望	一四五
第二章：龔橙的著述與學術	
第一節：引言	一五一
第二節：龔橙著述的考察	一五二
第三節：龔橙學術的考察	一六七
第四節：龔橙的學術特色與淵源	一七七
徵引書目	一九七

上
編

本

論

第一章 論《詩》義之多重與《詩》本義之詮釋

第一節 引言

漢代的班固（32—92）在《漢書·藝文志》中曾感慨的說道：

漢興，魯申公爲《詩》訓詁，而齊轍固生、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①

事實上流傳於漢代的《詩經》詮釋，還不僅止於此四家而已，近年出土的阜陽漢簡《詩經》就有可能是一獨立於上述四家的《詩經》解釋派別。^②究竟流傳在漢代的解《詩》派別有多少，目前已不得而知，但若每一家的詮釋就代表了一種《詩》義，那麼至少在漢代就有四種不同的《詩》

義。班固最終在「不得已」的情況之下，選擇了他認為較接近「本義」的《魯詩》，正透露了他對《詩經》詮釋活動中所產生的紛歧與莫衷一是的現象感到無奈與不安。為什麼會有這許多的解釋的差異又為什麼會大到另立門戶？其實歸根到底，最該問的似乎應是：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不同的《詩》義並存呢？宋代的歐陽修（1007－1072）或許是最早觸及到這個問題的經學家，在《詩本義》一書中，歐陽修為了探求真正的《詩經》「本義」，將先秦兩漢時期所形成的《詩》義析分為由「詩人之意、太師之職、聖人之志、經師之業」等不同階段所衍生出的四種不同《詩》義，並且認為「今之學《詩》者不出於此四者，而罕有得焉者。」^③清代的魏源（1794－1857）在《詩古微》一書中也指出《詩經》有經由「作《詩》者之心，而又有采《詩》、編《詩》者之心焉；有說《詩》者之心，而又有賦《詩》、引《詩》者之心焉。」^④等情況所形成的種種《詩》義。稍後於魏源的龔橙（1817－1878）更在歐陽修、魏源之說的基礎上，精密地分析了《詩經》在創作、采集及應用等各種早期不同階段所衍生出的種種不同《詩》義，他在《詩本義》書中是如此陳述這個論點的：

有作《詩》之誼，有讀《詩》之誼，有太師采《詩》瞽矇諷誦之誼，有周公用為樂章之

誼，有孔子定《詩》建始之誼，有賦《詩》引《詩》節取章句之誼，有賦《詩》寄託之誼，有引《詩》以就己說之誼。⑤

龔橙對《詩》義（「誼」即「義」）的區分可說是歷來最繁細的，而其分析或許在一定程度內確實能解答《詩》義紛陳的現象。但回到班固的問題，孰為「本義」？龔橙對這個問題並沒有直接回答，不過他主張：

讀《詩》者，自當先求作《詩》之心，以通其詞，而後知古太師與周公、孔子之用，與賦詩、引詩之用，豈可漫無分別？⑥

似乎暗示只要把這些不同層次的詩義釐清，就可以尋求《詩經》的正確「本誼」。

龔橙的論點的確在相當程度上對上述問題的解答，提供了不少具體正面的啓示。不過，若再順著班固的思路繼續深入思索，則必然會出現這個問題：如果確有《詩經》「本義」存在的話，又為何會出現這麼多不同的《詩》義？如果不是像班固、歐陽修、魏源及龔橙等人一樣，或為如何探尋那定於一尊的「本義」困擾，或執著於追求真正的《詩》義，那麼上述這種解《詩》派別並存及《詩》義紛陳的狀況，其實不正表明了在《詩經》詮釋過程中，人們對《詩》義的掌握與

理解是豐富且多元的。姑且不論那一家或那一種的《詩》義才是「真正的」（genuine or authentic）《詩》義，如此多的不同的《詩》義並陳，這就顯示出了「《詩經》意義的多重性」。由於《詩經》本身即具備詩歌的質素，因此以下不妨透過古典詩論和文論對詩歌意義的探討，來對此問題做一反省與觀照。

第一節 詩義之多重

近人朱自清（1898－1948）就曾敏銳地注意到詩歌意義多重性的問題，在《新詩雜話·序》中他提出這樣的觀點：

意義是很複雜的。朱子說：「曉得文義是一重，識得意思好處是一重」；他將意義分出「文義」和「意思」兩層來，很有用處，但也只說得個大概，其實還可細分。⑦

朱自清雖然提到朱熹（1130－1200）區分意義的方法，但直接啓發他用這種細緻分析的方法來對意義進行探索的，其實是從英人理查茲（I. A. Richards，1893－1979，朱譯為瑞恰慈）、奧格登（C. K. Ogden，1889－1957）和燕普蓀（William Empson，1906－1984）等人的學說而來。朱自清在

〈語文學常談〉一文中援用理查茲與奧格登之說，明確地提出「多義」的概念，其云：

……語言文字是多義的。每句話有幾層意思，叫做多義。唐代的皎然的《詩式》裏說詩有幾重旨，幾重旨就是幾層意思。宋代朱熹也說看詩文不但要識得文義，還要識得意思好處。這也就是「文外意思」或「字裏行間的意思」，都可以叫做多義。⑧

他又指出理查茲分析語言文字的意義有四層：一是文義，就是字面的意義；二是情感；三是口氣；四是用意。他認為聽話讀書如不能分辨此四層意義，那就會不了解，甚至誤解。⑨而在〈詩多義舉例〉中他則承認燕普蓀的《多義七式》（*Seven Types of Ambiguity*）的分析法很好，甚至欲嘗試用這種方法來分析中國古典詩歌。⑩

朱自清在受到英人理查茲、奧格登和燕普蓀等人的影響下，再回過頭去觀照朱子對詩文意義的分析，雖然覺得頗有用處，但終究難免感到粗略。其實除了朱子的區分之外，中國古典文論中並不乏類似這種對文學作品進行意義分析的論點，且其精微細緻的程度，也頗有可觀之處。如早在六朝時的劉勰（465—520）即已提出「重旨複意」說。《文心雕龍·隱秀篇》云：

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隱。隱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獨拔者也。隱以

複意爲工，秀以卓絕爲巧，斯乃舊章之懿績，才情之嘉會也。夫隱之爲體，義生文外，秘響旁通，伏采潛發。譬爻象之變互體，川瀆之韞珠玉也。⑪

所謂「隱」，指的就是「文外之重旨」。而「重旨」就是「複意」，也就是說文章要有曲折重複的意旨。爲了達到這種效果，就勢必在文章表面的一層意思之外，另外還有言外之意，此即所謂「義生文外」。⑫劉勰在這裏特別強調「文外之重旨」、「義生文外」，如此一來，自然就隱含了「文內之旨」或「文內之義」這樣的論點。可以說，正是「文內義」與「文外義」構成了主義的全部。然而，對劉勰而言，他所謂的「隱」不是僅僅要求有「文外之重旨」而已，更重要的還在「隱以複意爲工」，也就是要求所寫的事物具有豐富的含意，而這和古代「辭約旨豐」、「言近意遠」之類要求有密切聯繫。⑬如此一來，不但可造成文外義之曲折重複，更可以使文章具有含蓄而富有餘味的效果。雖然劉勰並沒有明言「文外之重旨」究竟可以分析到幾重，但他既然強調文外義旨之曲折重複，則其論點本身就具有再進一步開拓與延伸之可能。

在劉勰之後，唐代詩僧皎然（約720—約805）就在其基礎上提出了「重意」說，⑭這是朱自清在《語文學常談》一文中已提及到的，不過朱自清並沒有對皎然這個說法多做著墨。皎然在《詩式》卷一中的「重意詩例」中是如此闡述這個論點的：